天津都统衙门再研究

马　振　举

天津都统衙门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在天津建立的一个临时政府，也是列强对天津人民进行殖民统治的侵略机构。这个机构在存在的两年中，列强为维护其统治，在军事镇压和政治扩张的背后，亦实施了某些有益的市政交通工程，本文就它的主要历史活动，做一评述。

一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城。随着城池的陷落，在津的督道府县各官，皆弃城逃走。直隶总督裕禄走北仓，“知罪重，以枪自击之”，津道方恭钊和知府林际康，“怀金五十与印，俱至青县”，其余也西逃杨柳青，皆“若不知有守城之事者”①。由于驻津各级官员的走逃，清政府统辖的天津地方政府，也即宣告垮台。

外国占领者如何统治天津？开始各列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主张得城后即杀戮无遗者，有主张严行杀（伐）者”，独日本兵官主张剿捕乱匪，保护商民。英俄均赞成，“议遂定”。由此，攻占天津的各国便“议定分据地方”。它们以鼓楼为中心分占四隅：西南隅属英，西北隅属法，东南隅属美，东北隅及河北属日，河东及铁路并北土墙内外属俄，德国兵到津最晚，“故后始分一地以属之”②。

外国的分区占领，也需有一个共同的统治机构。为此，城陷两天后，八国联军头目即开始酝酿组织各国共同统治天津的临时政府，以便用以协调各国间的矛盾，进一步镇压天津人民爱国运动，并为进攻北京筹备兵力和粮饷供应。

1900年7月30日，经过半个月的磋商，一个包括总文案、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处、财产管理处、军事部、司法部、公共粮食供应部等八部门在内的天津都统衙门（全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便在镇压义和团的血泊中成立了。当时各部门均由各国分别掌管。

都统衙门的最高统治——委员会，初由“在直隶作战联军各国司令官选出”的三人组成，即由对华出兵最多的俄、英和日本推出。后因他国的嫉妬，翌年4月，委员会又增加法、德、美和意大利代表③，形成七国对天津的共同统治，天津便成了脱离清政府管辖的“非中国之天津”。

都统衙门的辖境，除天津城外，至1900年11月，已“扩张到包括海河两岸在内的一条狭长地带，大致从北直隶湾扩张到天津西和西北约二十五公里一带地方”④。但不包括其中的各外国租界、兵工厂、营盘、铁路、电报及其他早为联军占领的军事机构。为了统治方便，还将管辖范围划分为五个行政管理区，即天津城区、城南区、城北区、军粮城区和塘沽区，

各区“委派一名军官担任该区长官”⑤。

天津都统衙门，做为外国的一个临时政权机构，存在了两年零一个月，直到1902年8月7日，才奉各国统帅之命将机构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官员办理”。8月15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接管了天津地方政权，从而结束了都统衙门对天津的殖民统治。

二

天津都统衙门做为帝国主义的军事殖民机构，其宗旨必然是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这主要表现在：

1.军事上的残酷镇压

都统衙门建立时，天津义和团虽已大部被镇压，然而“逗留津郡、溷迹市廛者，亦复不少”⑥。至于城外郊县和北京义和团，更比比皆是。因此，继续剿杀义和团必将仍是天津都统衙门的任务之一。其镇压活动，一是不断派兵向天津四周清剿，一是大力支援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剿。

清剿表现在对已撤到天津城外的义和团余部仍不放过，他们经常组织侵略军到独流、静海等地剿杀。“凡是‘拳匪’窠巢，无不枪炮齐施，痛加杀戮”⑦。尤其独流镇是张德成“天下第一坛”所在地，清剿更加残酷。

1900年9月8日，都统衙门出示晓谕，扬言“独流镇系属‘拳匪’聚集之所……立将该村剿除净尽”⑧。随后大批联军开赴该镇，将独流“焚毁大半，居民死伤者，妇女被奸污者，不计其数”⑨。对别处清剿也是如此，“在各处搜拿‘拳匪’甚多，皆陆续杀毙”⑩。

都统衙门对俘获的义和团首领，更是严酷审讯和残酷屠杀。如天津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和三仙姑，1900年被联军俘获后，即在都统衙门中审讯，受尽侮辱，而后“附轮船带回外国……遂不知其所终”⑪。谭焕文，原本直隶后补道，城陷后出津也因“与曹福田赴保定同谒藩宪，面陈欲夺天津城”⑫而被视为义和团首领，1901年被联军俘获后交到天津都统衙门。都统衙门将他游街示众，“进东门出西门，绕至北门”，最后将其枭首“悬挂北门示众”⑬。

总之，在天津都统衙门统治时期，天津及附近义和团和百姓被杀戮的无计其数。

进剿表现在它全力支援八国联军向北京进攻。

天津是北京门户。到义和团运动时，都统衙门更把天津做为联军进攻北京的桥头堡，从各方面为之提供方便和援助。由于都统衙门的支持，“西兵来者日多，一日塘沽至天津火车，每日改行四次”⑭。至8月3日，联军已在津编组了18811人，大炮70门。又是由于都统衙门的支持，从7月22日至8月4日，联军在津召开了三次军事会议，决定“从速准备一切，以便进军北上”、“研究用兵细节”和“商定进军作战各有关事项”⑮。一切安排就绪，8月5日，八国联军分两路由天津出发，进攻北京。

在这一进军过程中，天津都统衙门还“帮助联军部队寻觅营地，并供应联军粮秣及运输工具——牲口、车辆、船只、苦力等等”⑯。这说明都统衙门对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确实起到“驻扎天津、以通馈运，并作为后队”⑰的作用。正是天津都统衙门的这种保证作用，使帝国主义侵略军仅用八九天时间，就攻陷了北京城。

2.政治上的扩张势力

这主要表现在强权政治和在津租界地的迅速扩大。

（1）对地方有绝对统治权

都统衙门《条例》明确规定：委员会在管辖的天津城区内，“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特别是四个郊区，各区长官组织并指挥“城区约束之外的独立工作”，具有“比城区之内任何官员都掌握几乎绝对的专制大权。⑱这即是说，都统衙门对天津地方有超越中国法律之上的绝对统治权，充分暴露了它军事殖民机构的侵略本质。

（2）对人民有绝对惩治权

都统衙门《条例》规定：它有权“惩办本地居民”，甚至“驱逐出境、判处死刑”⑲。它通告人们，要当尊令守法的“顺民”，否则“决不宽贷”。如敢反抗，或“串通匪徒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⑳以此来镇慑人民。这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个外国侵略机构的殖民性质。

（3）对天津有绝对经济支配权

都统衙门《条例》规定：它有权“使本地人承担法律义务”，强迫人民“缴纳军税，同时征收中国政府的法定税收”；它有权处理“一切属于中国政府的动产，并对从居民中没收的一切财产进行拍卖”㉑等等。这就是说，它把自己置于凌驾中国法律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有对天津绝对的经济支配权。

（4）对天津有绝对占领权

都统衙门把占领的天津视为“非中国之天津”，甚至不准中国炮船在附近河上行走。如当时子牙河铁锅店一带，“劫案迭出”。负责治安的直隶翼长黄星海，曾拟派炮船数只到该处梭巡，提出这“不惟于中国商民有益，亦可保护往来洋兵”。然都统衙门却粗暴拒绝。声称：“该处现在各国暂管界内……岂容以〔中国〕砲船往来界内乎？”㉒绝然一付异国征服者的姿态。

天津都统衙门这种绝对的残暴统治和专制横行，在近代半殖民地的中国各地，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当时英人派伦所说：“这个政权是军人的创造，是为了在没有中国政权存在”时，“以实行法治，保障外国侨民……占领中国领土的”㉓。他一言道出了这个政权机构完全意义上的殖民性质。

天津都统衙门，也是在天津外国租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际集团”组织。这个“国际集团”建立起来后，又为外国在津租界的新建和扩张，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英国于1860年12月第一个在津建立租界，占地四百六十亩。后又三次扩界，其第三次即乘都统衙门建立，凭借取得的军事政治势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合同”，使其租界“推广至墙子河外”，占地达五千六百余亩。㉔成为各租界中最大者。

法国于1861年在津取得三百六十亩的租界地。1900年10月22日，驻津领士杜士兰也乘都统衙门掌握天津行政大权之机发表通告，“将非法侵占之地强行纳入租界管界”,㉕使租界面积扩大了二千多亩。

日本依据1898年9月29日《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在津将一千六百六十七亩划为专管租界和预备租界。都统衙门建立后也乘机扩大，先是驻津领事郑永昌与法领事私相授受，将法国预备租界八十九亩沼泽地让与日本。1902年日又擅自将南门外至海光寺约二千五百亩划为扩张租界，并在“城濠以南划界插签”，书写“从是大日本军军道之地”字样㉖。

在都统衙门存在的两年之中，不仅已建的英、法、日乘机将租界面积扩大，而且过去未在天津建立租界的俄、比、意、奥等国也纷纷借机抢夺，其中占地最大者是俄国。都统衙门成立两个月后，俄公使格尔斯即从天津给沙皇发密电，称："我国军事当局提出了在天津建立俄国租界问题，租界拟建在我军保卫城市时流血最多的那部分"㉗。11月5日，俄使又向各国领事团发通知，声称"俄国军队曾在海河对岸车站附近抵抗义和团与清军攻击，保卫了外国租界"，"因此俄国政府保留对以下地区的绝对主权，即在海河对岸一端"㉘建立租界，面积达五千四百七十四亩。

天津租界的扩张和新建，虽由各国领事，而为并非都统衙门直接经手，但从都统衙门《条例》所规定的必须忠实"执行联军各国司令官与各外国领事向其提出的各项要求"看，㉙它插手其事、并起着扶助和保证作用，是当然无疑的。这点连侵略者自己也承认："这个商埠（指天津）的租界和外国人必然得到的利益，都是都统衙门统治的令人称羡的纪念碑"㉚。

三

无疑，天津都统衙门在津的军事与政治活动极大地加快了天津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但同时出于侵略者的目的，又在整顿市容和水陆交通方面做了如下的事情。

1.拆毁城垣、修筑马路

天津初被八国联军攻陷时，"市井多被焚劫、近郭诸村落，悉干戈俶扰，苍黄沸乱"㉛，再加"街道狭窄、死尸遍地，到处可闻到在酷热天气里腐烂的尸体臭味"㉜。街道巷间、环境卫生等各方面，都亟需整顿。面对此情，天津都统衙门为了建立长久统治，在强制苦力从事埋死尸、清除街道，采取卫生预防措施的同时，还实施了不少改造城市、修筑马路等工程。

1901年1月21日，都统衙门出示晓谕：决定将天津"周围城墙全行拆尽"。

都统衙门所以要拆毁天津城垣，虽有许多军事和政治目的，但同时亦有一定的改造城市之意。晓谕说："照得津郡街市地面窄狭，于各商往来运货甚为不便"，因此"城墙全行拆尽，即以此改筑马路之用"。并宣布"将城厢大街小巷尽皆绘图，询悉欲按图测量，以为开筑马路之计"。㉝这些决定，从长远看应该说是有益于人民生活。

拆城工程，从1901年初即已开始，以10,000元和10,000袋米为代价，承包给商人。据记载：拆下的城砖大部用于修复法租界和日租界，而碎砖则被都统衙门作为铺路之用。两年间，都统衙门在津修筑马路多条。如"由闸口河边至铁桥止……建造马路一条，共宽六丈为度"㉞；由"北门外至御河滨修造马路"㉟；另外沿海河与大运河前滩地带，原是"一堆肮脏破烂的茅草房子与船只"，修成一条"碎石铺成的宽阔大道，为城里往来的交通创造了极好的条件"㊱。这样，天津围绕旧城便形成一条环城交通干线，改变了旧日城墙脚下"破烂的茅屋成堆、滋生病菌的池塘成群"的面貌。与此同时，在城里还将四"城门之间的两条穿城大街也修直并加宽"㊲。总之，拆城筑路工程，使新的马路"代替了中世纪以来古老的土道"。不仅大大便利了天津城厢内外的交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

此外，1901年3月，都统衙门还批准了中外资本家在城里开办自来水，并使"地下有一个

较好的下水道系统”[38]；后又批准拆除一些旧房屋，“建造了外国式的住宅和商行”，使古老的天津城增添不少新内容。

2.疏浚海河，裁弯取直

海河修治也是都统衙门改善天津交通的一项较大工程。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日记》中曾说：“自若干时日以来，余即尝建议，拟将白河（指海河）自天津起加以疏通修理，以便炮船再可直达天津”。至于办理此事，“宜由‘天津临时委员会’担任”。正是在瓦德西指示下，天津都统衙门于1901年春组成一特别委员会，“监督海河工程局工程师们进行的浚治工程”[39]。同年3月22日便发出布告：“本都统等现派工程司员将海河数处弯曲挖直”[40]。

裁弯第一处工程于1901年10月21日在天津下梢开始，经过半年多的疏浚，至翌年7月，“一条23英尺深、0.75英里长的河道开始通航”。由于裁弯取直，使海河航道缩短了2.1英里。第二处1.1英里的裁弯浚治，也于1901年开工，翌年9月通航，缩短河道3.1英里[41]。同时，也在大运河与海河上游修建了一些码头，为海河内来往船只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疏浚海河的同时，都统衙门还拨银191,471两在法租界河坝道（老龙头车站对面），建造一座吊桥（后称万国桥），此桥到都统衙门撤销后完工。

海河是华北五大河汇潴入海的尾闾，由于河道多弯、疏浚不力、泥沙逐年淤垫沉积，致使海河航道经常堵塞。至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似乎大于木船的任何船只，都不能开抵天津”[42]。这次由于都统衙门组织施工，在天津与大沽间的海河上，削平许多河弯，大大畅通了海河航运。据海河工程局报告：1902年8月21日，就有一艘自1899年来吨位最大的外轮——“朕新号”驶进了租界码头。自都统衙门疏浚海河后，又经清朝、北洋二十几年的不断修建，天津终于“成为中国海岸贸易上的一个能容吃水量最深的船只的现代港口”。

都统衙门督办海河修治，主要出自侵略的需要。正如瓦德西所说：这样“炮船再可直达天津”。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还把清政府必须支持浚治海河写进了《辛丑条约》的条款中。但修河工程经费，却由中国人负担。当时经费来源有两项：一是中国政府每年拨款63,000两；二是关税项下附加河捐（1901年将进出天津的船只，值百抽一的关税加倍为值百抽二做为河捐）。这样1902年修河经费达116,371两[43]。督办海河工程说明，天津都统衙门既履行着行政机构职责，也忠实地执行着殖民机构的职责。

以上为都统衙门在津实施的公共市政工程。从这些工程效益看，虽有其主观上侵略性的一面，但不容否认，也有客观上对天津除陈布新、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

应如何评价天津都统衙门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它是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利益的殖民政权，在统治天津的两年中，犯下了累累罪行，使天津成为各帝国主义在华一块短暂的完全殖民地。其次，天津都统衙门做为先进国家的代理行政机构，对当时古老天津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社会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即伴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它们也往往带进一些先进的事物，并对被侵略国家的旧的陈腐东西进行某些革除，以适应自己侵略的需要。如马克思所说过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4]。

①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70页、47页。

③七个委员是：俄国华格克上校、英国鲍尔中校、日本青木中校、德国法克罕少校、法国阿拉伯 西 上校、美国福脱少校、意大利克沙诺伐司令官。

④⑤⑱《天津历史资料》（4）第91页。

⑥《义和团》（一）第286页。

⑦《义和团》（二）第54页。

⑧《天津历史资料》（15）第43页。

⑨⑫《义和团》（二）第55页。

⑩⑬《义和团》（二）第59页。

⑪《义和团》（二）第56页。

⑭《义和团》（三）第209页。

⑮刘风翰：《武工军》（下）第69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⑯《天津历史资料》（4）第89页。

⑰《义和团》（三）第201页。

⑲㉑㉙《天津历史资料》（4）第90页。

⑳《天津历史资料》（15）第41页。

㉒《义和团》（二）第122页。

㉓㊳《天津历史资料》（4）第92页。

㉔《天津市概要》1934年版，第43页。

㉕《天津租界》第38页。

㉖《义和团》（一）第282页。

㉗《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49页。

㉘《天津历史资料》（4）第88页。

㉚《天津历史资料》（2）第136页

㉛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1938年版16卷11页。

㉜《八国联军在天津》第214页。

㉝《义和团》（二）第50页。

㉞《义和团》（二）第58页。

㉟《天津历史资料》（15）第55页。

㊱㊲《天津历史资料》（4）第93页。

㊴《天津历史资料》（4）第94页。

㊵《天津历史资料》（15）第52页。

㊶㊸《天津历史资料》（2）第142页、143页。

㊷《天津历史资料》（3）第48页。

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